

从伦理选择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逻辑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杨革新（Yang Gexin）

内容摘要：《文学跨学科研究》作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会刊，为学者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核心术语与话语体系提供平台。本期特别推出专栏文章，围绕伦理选择、科学选择和脑文本等关键词，从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如何从基础理论出发构建其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构建了以伦理选择为核心的基础理论，并以伦理选择为核心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阶段论，即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再到科学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自然选择出发，提出文学起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指出，人类在完成自然选择阶段之后还必须经历一个道德完善的选择过程，即伦理选择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必然逐渐消退，并最终完全被科学技术标准所取代，科学人的世界由此诞生，人类正式进入科学选择时代。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

作者简介：杨革新，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和英美浪漫主义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成果。

Title: From Ethical Selection to Scientific Selecti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As the academ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collects a cluster of articles to probe in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key terms of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uman civilization undergoes three successive stages: natural selection, ethical selection and scientific selection.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need of hominid to express their ethical concepts, and ethical selection is carried out through ethical choice, which is not onl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thical selection, but also the cor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owever, humans in the stage of ethical selection will gradually die of disease and aging and yield to a new world composed of scientific people. When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people appear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selection, human beings step into the age of scientific selection.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natural selection; ethical selection; scientific selection

Author: Yang Gexin, Ph.D.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2, Chia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ritish and American romanticism literature (Email: ygx80080@163.com).

自 2004 年 6 月聂珍钊先生在南昌召开的“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想，随后又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 2004 年第 5 期发表题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的文章，专门阐释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聂珍钊先生及其团队的共同推动下已走过 18 年发展历程。作为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批评界兴起的“理论自恋”和“术语自恋”等不良倾向的回应（聂珍钊，《导论》4），文学伦理学批评从文学起源等基本问题入手，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众多其他批评理论和方法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回到文学作品的历史语境，用当时的伦理立场和伦理视角解释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各种生活现象和伦理事件，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并从中获取历史和现实提供给我们的道德教诲与伦理警示。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方法论的建构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表现出同美国伦理批评不同的特点。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是西方伦理批评的照搬移植，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它以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为基本理论，开创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阶段论，即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伦理选择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这三个发展阶段。自然选择解决人的形式问题，回答了“我来自哪里”的问题；伦理选择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科学选择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回答了“我去向何方”的问题。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自然进化，即以弱肉强食为法则；伦理选择的方法是伦理教诲，即学以成人为中心；科学选择的方法是科学技术，即以技术更新为手段。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的提出不仅从源头上厘清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人的本性等问题，还为将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下将详细论述文学伦理批评如何从文学起源开始，以

伦理选择为基本理论构建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以及三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

自然选择与文学起源

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从源头上厘清文学是如何产生的，即文学的起源问题。对此，古今中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目前广为流传的观点主要包括“模仿说”、“巫术说”、“游戏说”和“劳动说”等。“模仿说”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的模仿本能，文学艺术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模仿的结果。¹这一说法承认文学的源泉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但把模仿解释为人的某种天性，这显然忽视了社会实践在形成人的心理能力上的巨大作用。“巫术说”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和仪式活动，但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等民俗学家则提供了某些原始部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的资料²，从而使得“巫术说”难以自圆其说。“游戏说”认为文学艺术产生于原始人的游戏冲动和游戏活动，但并未解释这种“本能冲动”或“天性”来自何处，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揭示文学艺术起源的真正原因。

“劳动说”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人类的生产劳动，但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表明，劳动不是文艺的起源，劳动只是文艺起源的条件。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我国文艺界广泛认同和普遍接受的观点，甚至还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聂珍钊先生曾在《文学评论》杂志2015年第2期发表文章专门讨论“劳动说”被中国学界广为接受的原因，认为这是中国学界对马克思“劳动创造了美”和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观点的误读。³据聂珍钊先生考证，“劳动创造了美”（马克思 93）是对原文断章取义的结果，其原意是“劳动创造了美的产品”。这里的美并不是抽象的美学意义上的美，而是具体的“美的”、“好的”产品，因此，马克思讨论的不是“劳动同美之间的创造关系，而是强调了劳动同产品之间的生产关系”（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24）。马克思论述的重点是异化劳动而不是美学问题。“劳动创造了人”则出自于恩格斯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的相关论述：“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 550）。按照聂珍钊先生的分析，恩格斯讨论的主要是猿怎么进化为人的问题，是对猿猴通过劳动进化为人的理论概括，强调的是“劳动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强调人被劳动创造出来”（聂珍钊，“文艺起源

1 有关模仿说的具体内涵，参见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2 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2-80页。

3 参见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文艺评论》2（2015）：22-30。

于劳动”26)。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问题，也没有发表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论断。

有关文学起源的“劳动说”看似有理有据，实则歪曲了恩格斯的原意，混淆了恩格斯有关劳动、人和艺术之间关系的逻辑论述。这三者的合理逻辑应该是：“通过劳动，猿使自己变成人；人在劳动中使自己获得了艺术创造的能力，然后才能创造出包括艺术在内的文明”（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28）。显然，文学的创作主体只可能是人，而不可能是劳动。“劳动说”虽然没有很好地说明文学起源问题，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根溯源的视角，启发我们从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角度探讨文学起源问题。由此，我们发现人类文明的出现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从猿到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做出的第一次选择，即自然选择，然而，这只是一次生物性选择，其最大的成功在于使人获得了人的形式，即人的外形，从而能够从形式上同兽区别开来，但这次选择并没有解决是什么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问题。达尔文也承认：“自然选择在文明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只考虑到了人从半人半兽的状态向近代野蛮人的状态进展的一段情况”（209）。诚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进化理论解决了人类是从某种低级生物发展而来的问题，但这只是从物质形态的角度回答了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并未对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做出解答。

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论断，指出劳动是推动从猿到人转化的决定性力量，并进一步强调“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513）。制造工具是真正意义上劳动的开始，有了工具，人类才能进行各种复杂的劳动，从而推动劳动本身更加多样化。社会分工随之产生，畜牧、农业以及纺织、冶金、制陶等手工业相继出现，后来又有了商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恩格斯用劳动解释了人从猿进化而来的问题，但并未超越生物进化的观点，只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具体化。因为劳动不是人本身，劳动只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外部条件或人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因此，用劳动并不能解释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可见，恩格斯和达尔文用自然选择解决了人是如何进化而来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问题。

人类通过生存斗争以自然选择的方式逐渐从猿进化为独立的高级物种，但这只是从外形上同兽区别开来，只有当伦理意识产生，理性逐渐成熟之后，人类才最终从本质上区别于兽。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原始人类逐渐意识到血缘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就会招致不幸，由此他们开始思考以血缘为基础的各类关系并力图做出解释。在这种思考和认识中，最初的伦理意识产生了，这进一步促使原始人类思考如何从混沌和混乱走向秩序。随着原始人类的伦理意识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理性越来越成熟，并形成了相应的伦理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最为核心的观念就是禁

忌，它是古老人类形成伦理秩序的基础。理性不仅让人类思考如何认识自己，还思考如何将禁忌文字化，使不成文禁忌变为成文禁忌并流传给后代，这最终导致文字的产生和文学的出现。成文禁忌在中国最早的形式是卜辞，在欧洲则往往通过神谕体现。在成文禁忌的基础上，禁忌被制度化，形成伦理秩序。因此，人类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而文学最初的目的也是将禁忌文字化。基于此，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自然选择入手提出了“文学是由于人类最初表达伦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的产生是为了把伦理文字化，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Nie, “Basic Theory” 193）的观点。

伦理选择与人禽之辨

自然选择以进化为方法完成了从猿到人形式上的转变，导致人类这一新物种的出现。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之后，还面临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即如何从本质上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如何认识人自己，一直是哲学和文学领域探讨的重要话题。纵观人类发展历程，人认识自己主要采用的是以“他者”为参照展开辨识或划出边界的方法。在确认自身方面中西路径不同：中国是通过人禽之辨确认人的本质，西方则是通过人神之辨来认识自己。中国儒家哲学将人与禽兽进行辨识与比对，认为人有道德，禽兽没有，所以人不同于且高于禽兽，人如果没有道德，就是禽兽不如。与此相对，西方宗教哲学主要将人与神或上帝进行辨识与对比，认为人有原罪，上帝至善，所以人不同于且低于上帝，人如果没有“信、望、爱”，便会进地狱。尽管中西在认识自己的问题上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个关键词：道德或善。文学伦理学批评正是基于这一关键词提出，人类在完成自然选择阶段之后还必须经历一个道德完善的过程，即伦理选择阶段。自然选择是人的形式的选择，是人作为新的物种的选择；伦理选择是人的本质的选择，是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选择。在中国，先秦儒家哲学通过人禽之辨强调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认定正是道德使人与禽兽保持了距离、划清了界限。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¹这即是人不可以与禽兽为伍的思想。《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能养”并不足以区分人与动物，甚至动物界的“能养”行为诸如“鸦反哺”、“羊跪乳”、“马无欺母之心”还表现出某些道德特征。但是，动物代际之间的“能养”行为只涉及物质生活层面，而人类代际之间的“能养”行为还涉及精神生活层面，即人类的“能养”行为是“敬心”的表达与实践方式。正因为“敬心”的存在，人类孝道所要求的“能养”才区别于动物的“能养”，

1 本书所引用《论语》《孟子》《荀子》原文，皆采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下不一一注释。

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类具有动物所没有的道德精神。

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将人禽之辨与人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孟子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指出人在特殊情境下会流露出无蔽于后天习染的本真情感——恻隐之心，并进而推出“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公孙丑上》）。这意味着孟子将这四种心理状态背后的内在机制视作人之独特性的内核。孟子虽然承认四端是人性“固有之”，但同时又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操则存，舍则亡”（《告子上》）。四端之心就其表现来说，毕竟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如何从“四端”对应形成仁、义、礼、智即“四德”，孟子给出的回答是：人的自我选择，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在我者”（《尽心上》）。孟子通过主体的选择把人禽之辨落实于对人伦礼仪的自觉践行之中，强调了道德实践活动对于“成人”的意义。他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所谓“以礼存心”就是指善“端”之“心体”的存养与自觉是在主体的伦理实践过程中实现的。针对人作为主体如何进行选择和实践，孟子进一步提出，“人之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如果一个人只讲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没有教养，也接近于禽兽了。这说明人之所以为人还体现在是否有教化，即人具备四端还需要接受教育。

在西方，《圣经》对始祖的描述为我们理解人禽之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在上帝创造的伊甸园里，最初出现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其它生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人类始祖的亚当和夏娃像野兽一样赤裸着身体，饿了就采摘树上的果子吃，渴了就喝河中的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此时，亚当和夏娃只是兽中的一员，不具备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的能力。伊甸园里长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智慧树，上帝禁止他们采食，因为一旦吃了树上的果子，人就有了智慧，可以分辨善恶了。然而，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有了智慧后，马上意识到自己赤身着露体，感到羞耻，于是把无花果树的叶子摘下，为自己遮羞。亚当和夏娃的这种意识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意识，有了伦理意识就能分辨善恶，这是辨别人是否为人的标准。善恶的概念与伦理意识同时出现，是评价人的专有概念，因此，善恶是人类伦理的基础。夏娃渴望得到智慧并偷吃了智慧果，这并不是宗教所说的人类的原罪。原罪实际是人类通过伦理选择把自己从兽中解放出来后，对人身上仍然残留的兽性特征的理解。同样，古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关于“人”的谜语，实际关注的也是一个如何将人同兽区别开来的问题。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人类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外形之后，人类发现自己身上仍保留着许多兽的特性，如生存和繁殖的本能等。斯芬克斯因为有人的头脑而认识到自己不同于兽，但是由她的狮子身体和蛇尾所体现的原欲又让她感到自己无异于兽。就她的外形而

言，她既是人也是兽，她渴望弄清自己究竟是人还是兽，并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自己关于何为人的困惑，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斯芬克斯之谜。显然，斯芬克斯之谜是人类在经过自然选择之后需要解决的一道伦理命题，即必须在做人还是做兽之间做出选择。这也说明人类在经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还需要经历第二次选择：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是内容的选择、本质的选择，其目标是解决做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命题，无法通过进化实现。伦理选择要求选择主体按照某种社会要求或道德规范进行选择，或者根据特定伦理环境和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经过教诲，教诲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教，然后是学。通过教导和学习获得教诲、学会做人，即教与学以成人。刚刚诞生的婴儿只是形式上的人，由于伦理意识还没有出现，与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随着婴儿成长为幼儿，其认知能力得到加强，伦理意识随之产生，在父母的教导和环境的影响下有了关于人的概念，进而能够对自己作为人的身份进行确认。正是对人的身份的确认，使幼儿进入伦理选择阶段。实际上，婴儿自出生后存在着做人或做兽两种可能性，只有通过教诲，才能做出选择做人而不做兽的伦理选择。如果没有教诲，幼儿的伦理意识就难以产生，也就不能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强调的就是教诲的作用。“学以成人”既是一个哲学主题，更是一个伦理主题。做人是伦理问题，如何做人是哲学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做人的方法不仅需要学习，也需要教导，教与学就是教诲。“伦理选择强调教诲的方法，就是强调教与学的方法，强调经由教诲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从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聂珍钊、王松林 15）。

科学选择与人机之争

人类文明发展以自然选择为起点，历经伦理选择，最终以科学选择结束，其内在逻辑正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在自然选择阶段，原始人群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学会了劳动，并逐渐出现了社会分工，随后萌芽出原始人类的伦理意识，进而形成了伦理禁忌，继而出现记载这些禁忌的文字，这就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文学起源“伦理表达说”的逻辑起点。古猿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进化获得人的形式，而人的出现意味自然选择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人开始与兽进行区分，即伦理选择的开始。从中西人禽之辨的演变来看，伦理选择解决的是人的本质问题。获得形式的人通过教诲的方法获得人的本质，变为道德的人，从而使人在形式上，更在本质上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我们目前正处在伦理选择的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伦理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借助科学技术手段，这就决定了伦理选择最终必然走向科学选择。伦理选择的方法是教诲，科学选择的方法是技术更新。实际上，现有许多复杂的伦理问题如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伴随

的问题都是借助科学技术解决的，这说明我们虽然处在伦理选择阶段，但已经开始与科学选择接轨。

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到孟子的“四端之心”，再到荀子的“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都强调了人与禽兽的区分需要依靠后天教化，需要明确划分人与禽兽的伦理区隔。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2017年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身份，人类历史上首位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诞生了。除此之外，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以技术方式创造了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如果任由此类案例推衍，那么如何界定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以及被编辑基因的新生命与一般意义上人的差别，或可成为我们这一代和未来人类需要面对的核心伦理问题。倘若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生命基因工程结合起来，使人类的自然生命不断朝人工化、机器化方向发展，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人化。那么，现代人类所依赖的“人禽之辨”的伦理基础就会被人与技术人、机器人相区别的新伦理原则取代，这就是后伦理选择时代或前科学选择时代的“人机之争”。¹

如果说“人禽之辨”讨论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何为第一性的问题，那么“人机之争”反映的就是人的主体性与技术性的矛盾。事实上，人机之争早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就已出现，其主要表现是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在这一过程中，人不知不觉成为标准化机器的零部件，在单调的机械劳动中失去自己，从而走向了机器化，即非人化或异化，从而导致了“人机关系”的紧张，也由此引发了早期产业工人罢工运动，出现了工人捣毁机器的行为，这可以看作是人机之争中人对机器的第一次反抗。如果说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机之争主要表现为人的“机器化”，那么当今人工智能时期人机之争则表现为机器的“人化”。人工智能使得机器从机械物跃升为智能人，人与机器的边界被彻底打破，机器似乎更像人，而人似乎更像机器。那么，人的价值在即将要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里如何得到体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新伦理原则来处理人与机器、人与技术的关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技术人”将需要什么样的新伦理原则？

在伦理选择阶段，人作为主体的人而存在，能够坚持用道德规范要求自已，并通过自我选择加强道德修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从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过渡的过程中，在风俗习惯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需要接受科学的检验。只有符合科学的习俗才会作为科学的一部分保留下来，而不符合科学的部分则会被摒弃。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必然进入逐渐消退的过程。长此以往，伦理道德的作用越来越小，并最终完全被科学技

1 文学伦理学批评把从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的过渡阶段界定名为后伦理选择时代或前科学选择时代。

术标准所取代。伦理道德科学化的过程也是去道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仍然依靠伦理选择完成。只有当伦理道德完全消失，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标准时，科学人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人类才正式进入科学选择时代。真正的科学人不通过自然生育方式产生，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方法繁殖，例如东野圭吾的小说《分身》（『分身』1993）中通过基因复制技术繁殖的非双胞胎孪生姐妹，美国科幻小说《克隆人》（*The Cloning of a Man* 1978）中富商通过自己体细胞核移植产下的男婴，都属于科学人。在科学选择阶段，人能够按照科学标准在实验室里制造人。如何掌握和发展克隆技术制造人，是一个科学选择的命题。但是，在后伦理选择或前科学选择时代，如何运用克隆人等技术的问题，以及以此制造出来的人的身份、地位等问题，实际上既与科学选择有关，又同伦理选择相连。从本质上看，目前科幻小说中的克隆人都还是在伦理选择主导下的科学选择的结果。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人数量的减少和科学人数量的增多，科学选择的伦理性质必然逐渐消失，科学人的选择最终将变成不受伦理干预的真正的科学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基础上提出的核心批评术语“伦理选择”、“科学选择”和“脑文本”是本期专栏文章重点讨论的话题。郭雯的“科学选择关键词”以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仿生人、克隆人和永生叙事为对象，梳理了科学选择的外延与内涵。王松林的“脑文本关键词”结合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阐释了脑文本的内在逻辑、生物属性和道德属性。陈红薇和杨洪霖从脑文本理论的角度研究改写，不仅揭示了改写创作的脑文本本质，也揭示了改写者脑文本实践的发生机制，从而为改写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彭石玉和艾琪运用伦理选择这一批评术语分析了《红字》中的伦理困境与海斯特的伦理选择。从本期专栏文章可以看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批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够在理论上解决一直困扰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问题，还可以在批评实践中指导具体文本解读。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不仅要回答文学问题，还要回答时代问题，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面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化，文学伦理批评应如何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这需要学界同仁共同贡献智慧和力量。

Works Cited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Darwin, Charles. *The Descent of Man*. Trans. Pan Guangdan and Hu Shouw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Engels, Friedrich.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7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文艺评论》2（2015）：22-30.

[—."“Literature and Art Originating from Labor’ Is a Misreading of Marx and Engels.”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 (2015): 22-30.]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Theoretical Study*. Beijing: Peiking UP, 2020.]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Wang Xianqian. *Compiling and Interpreting of Xunzi*. Compiled. Shen Xiaohuan and Wang Xing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